

## 引 言

全真教是由陕西人王喆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在山东创立的“新道教”。五十余年后，其弟子邱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优宠，全真教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一度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到了明代，全真教却相当地沉寂，与元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明中叶以后，全真教稍有抬头，在民间自相授受的全真教徒在长期的秘密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小的宗派，活动渐渐增多。至清初，全真教终于在龙门派的带动下从地下转到地上，出现了短暂的复兴。龙门派也因此成为全真教的一个最大宗派。

清代闵一得在其编著的龙门派历史《金盖心灯》中认为，龙门派是由邱处机所开创的。在此书卷一的《赵虚静律师传》中，闵一得这样记载了龙门派第一代律师赵道坚从邱处机受戒的经过：

（赵道坚）闻七真演教，独携瓢笠，谒长春邱祖，诚敬精严，执弟子礼。邱祖与语而奇之，曰：“此玄门柱石、天仙领袖也，他日续心灯而流传戒法者，必此子

矣。”遂侍祖游燕阐教。凡有作为，不言自合，或侍终夜不发一语。祖乃传以清虚自然之秘，栖隐龙门者多载。复出，侍祖于白云观，统大众。师于至元庚辰正月望日受初真戒、中极戒，如法行持无漏妙德。祖乃亲传心印，付衣钵，受天仙戒。赠偈四句，以为龙门派，计二十字，即“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之源派也。

闵一得认为：1. 龙门派的创始时间是在“至元庚辰”，即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 1280 年；2. 地点则是在燕京白云观；3. 龙门派二十字乃邱处机所赠；4. 龙门派名系因“栖隐龙门者多载”而得。

但是，据邱处机再传弟子李道谦撰写的《七真年谱》记载，邱处机年八十卒于“大元丁亥”，即公元 1227 年；又据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赵道坚已于辛巳年（1221）在西游途中病逝于赛蓝城。邱赵于“至元庚辰”传心印、付衣钵之事决无可能。因此，闵一得关于龙门派创始经过的说法就很可疑。那么，龙门派到底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

清末的陈教友有另外一种说法：

今世全真教，大抵长春法嗣为多，所谓龙门派也。然询之道教中人，云嗣马丹阳者为遇山派，嗣谭长真者为南无派，嗣刘长生者为随山派，嗣王玉阳者为昆崙派，嗣郝广宁者为华山派，嗣孙清静者为清静派。

考长春及诸真门人，无有以派名者，诸派之兴，其

起于明代欤！<sup>①</sup>

元代，自邱处机以后，历代掌教大宗师皆皇帝钦封，统一领导全真教。<sup>②</sup> 此间全真教道士和教外的著述，都没有关于七真创派的记载，又据清人刘献廷述孙宗武言：

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华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sup>③</sup>

陈教友据而推断：

今考王、刁系宋初仙人，华山、龙门俱有王刁洞。孙宗武之言，闻之白云观王清正，清正闻之华山马真一，当有据。长春曾主华山讲席，靳贞常当即为长春弟子。所以称龙门派者，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其后徒众日盛，创此法派，故云龙门也。世或谓长春曾居陇州之龙门，故号龙门派，恐非。<sup>④</sup>

认为龙门派乃邱长春再传弟子姜善信所开创，其地则为龙门建极宫，与邱处机曾居之陇州龙门无涉。

陈教友所作《姜善信传》谓：

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影印荔庄藏版，1983年。

②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57年。

④ 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六。

姜善信，河东赵城人，姿秉恬默，年十九，师事莲峰真人靳贞常道元，隐居华山王刁洞。后承师命修习龙门山，访王、刁故迹……其后三见聘，奏对多所裨益，（世祖）赐号静应真人。会龙门禹祀因兵而毁，善信募建之。陛辞日，敕赐曰“龙门建极宫”……复给田四十余顷，命五弟子俱为建极宫提点。远近亦称“天师”，年七十八羽化。<sup>①</sup>

且附注云：

《秋涧集》有《祭静应姜真人文》云“至元十一年甲戌二月十二日”，则姜当化于是年春初。

据此，则姜善信生于公元 1196 年，卒于 1274 年。此龙门山在山西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之间，与禹门口隔黄河相对。龙门建极宫系在大禹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陈教友认为。龙门派之“龙门”即是指此“龙门”。

另外，《金盖心灯》卷一《赵虚静律师传》鲍廷博注引《逸林·全真录》载“元世祖赐开龙门派，钦定二十字”，所以，陈教友认为，此系谱并非邱处机自作，也不是元世祖赐给邱处机或赵道坚的，而是赐给姜善信的。

从上述的零星史料，我们可以肯定，龙门派决不是邱处机所开创的，但姜善信的名字与龙门派系谱并不符合，而他所传弟子

<sup>①</sup> 《龙门正宗碧洞堂上支谱·校理本观宗谱序》亦云：“长春再传弟子姜善信，河东赵城人，师事莲峰真人靳真常，隐居于华山王刁后洞，奉师命修习龙门。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是时徒众日益，创法派，故名龙门也。”稿本 藏四川灌县青城山天师洞祖堂。

的详情也不得而知，所以，具体的创派过程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闵一得所肯定的龙门派第二代律师张德纯，三代陈通微都是在华山修行，而没有关于他们住修龙门的记载。四代周玄朴之后，南至四川青城山，以后又进一步南传，与龙门毫无关系。所以，关于元世祖赐派、姜善信创派的说法也有可疑之点。

考姜善信本系华山道士，后去龙门修习，又受到了元世祖的宠遇，他的弟子应该很多。龙门与华山地域相接，两处道士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龙门派极有可能是流散到各处的姜善信的弟子一传再传，后来形成一派，再追溯到姜善信和邱处机的。因此，陈教友所猜测的龙门派与其他七真派可能兴起于明代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史实的。

关于明清时期全真教的历史，当时人的记载很少，出于全真家之著述，亦不多见。且其中以讹传讹，以致谬种流传者有之；而语多忌讳，甚或故意捏造者亦有之。所以，颇令今天的研究者难窥全貌。但是，历史固然有它的偶然因素，但仍有必然规律可循。正如恩格斯所说：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存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sup>①</sup>

马克思在研究犹太教和犹太人历史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的指南，他说：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  
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sup>①</sup>

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明清时期的全真教，必须在深入研究和仔细甄别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先立乎其大者，尽量把全真教置于当时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去，置于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末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样一个酝酿着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弄清全真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道德面临解体、蜕变和新生的关头，是怎样接受这一严峻考验的。

基于这种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龙门派实际是全真教的一个改革派，是对元代全真教从兴起到鼎盛、腐化以至于萧条的反思和扬弃。全真教在元末明初，名声很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全真教在政治上与由蒙古族人主中原而建立的元王朝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由于全真教政治地位的提高所带来的雄厚的寺院经济力量使一部分上层道士生活腐化，所以，龙门派为了与他们划清界线，以“正宗”自居，标榜自己所奉行的戒律为邱祖嫡派，乃教外别传，从而为全真教恢复名誉，以正视听。而这种改革，到了明末清初，适逢其会，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下，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功。作为全真教“正宗”的龙门派因此复兴，并且带动了分散各地秘密流传的全真教徒纷纷“寻根溯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I 卷第 446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源”，于是出现了许多其它的全真教分派。龙门本身也因而衍生出许多小派，传播之广泛可与佛教禅宗的临济宗相媲美，故当时有“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语。

研究明清时期全真教从沉寂到复兴的历史，对于我们弄清中国宗教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弄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明代至清代中期（一八四〇年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真教。

## 第一章 明朝的道教政策与全真教的沉寂

一种宗教之产生和发展，固有其不可逆转之必然规律，但这一点并不能绝对化，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宗教的政策，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都对宗教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封建王朝甚至皇帝个人的崇尚或抑制，便成为历代道教兴盛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全真教在元代得到了蒙古王室的极力推尊，曾一度达到势焰逼人的鼎盛局面；而在明代，它的命运却恰好相反，遭到了历代皇帝的防范和抑制，其政治、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只能在下层和边远地区的民众中间秘密传播，不绝如缕，度过了漫长而寂寞的三百年。

### 一 全真教与元室的密切关系及明初诸帝对全真教的态度

金大定七年（1167）王喆从陕西来到山东，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了全真教。同时又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

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开始在下层平民中传教。三年后，王喆逝世，七真相继掌教。马钰掌教期间，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sup>①</sup>，注重个人修炼，不事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故此时全真教道士大都苦节自励，过着清修苦练、云游乞食的生活。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之后，始逐渐重视创建宫观和收授教徒。尹志平称刘处玄是“无为、有为相半”，至邱处机则是“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一，犹存而勿用焉”。<sup>②</sup>在此期间，他们以山东半岛为中心，招收了大量的信徒，并建起一批全真庵观。这样，全真教势立逐渐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招至京，金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世宗又招邱处机进京，命其主万春节醮事。二十九年，复招王处一进京，会金世宗“崩”，嗣位者金章宗即命王处一为其“先帝”主醮。全真教创立初期与金廷并无密切关系，虽然屡蒙召问，但均待以“客礼”，即使如此，这也大大地促进了全真教的传播和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云：此时全真教已是“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sup>③</sup>这表明在秦、冀、鲁、豫等地，全真教已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

公元 121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随即挥师南下，欲与南

段志坚：《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

<sup>②</sup> 段志坚：《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

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四库本

宋联合图金。河北、山东正处于三方交界，遂成为三家必争的咽喉要地。因此在这样的军事要地拥有很大势力的全真教必然成为三家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祐、兴定年间（1213—1221），三方都曾先后派遣使臣征召当时的全真教主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鉴于金朝行将灭亡，南宋孱弱，亦终不免，唯蒙古方兴未艾，势必夺取天下，于是却金使，谢宋聘，唯赴成吉思汗之召。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成为全真教从下层进入上层，并进而达到鼎盛的契机。当时成吉思汗正率领蒙古大军西征乃蛮，邱处机不顾七十三岁高龄，于 1219 年率十八弟子登上征途，冒着风沙大雪，经过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 1222 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非常欢迎，亲自召见多次，并询问为治之方和长生久视之道，邱处机则以“敬天爱民”、“清心寡欲”为对<sup>①</sup>。成吉思汗甚敬之，尊为“邱神仙”。次年，处机请东归，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掌天下道教，并蠲免全真道士的差役赋税。通过这次西行，邱处机更加认清当时是大力发展全真教的最佳时期，他曾这样告诫弟子：“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sup>②</sup> 因此，在他回到燕京以后，利用天时、地利、人望，大修宫观，广收门徒。不数年，所居之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即成为全真教活动的中心。

邱处机是一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虽然他也是一个宗教领

宋濂：《元史·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

②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甘水仙源录》卷十，《道藏》。

袖，但是在确定全真教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这一问题上，他的政治期望掩盖了他的宗教信仰，因而从邱处机开始，全真教就不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了。<sup>①</sup>

从邱处机住持长春宫，到尹志平、李志常相继掌教这三十余年里，全真教的主要活动就是大修宫观，广收门徒。仅在燕京及其附近，就建有宫观一百余处。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sup>②</sup>李志源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sup>③</sup>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sup>④</sup>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若干。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郛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sup>⑤</sup>潘德冲则在山东黄城创建了全真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在山东平阳主持编修《道藏》的时候，“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sup>⑥</sup>薛知微也“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度门弟子数百人”。<sup>⑦</sup>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更名志道）长期活动于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第二页。

② 李道谦：《大元宗圣宫主李尊师道行碑》，《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中，《道藏》。

③ 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9年。《终南刘先生事迹》，《甘水仙源录》卷八。

④ 《重阳成道宫记》，《宫观碑志》，《道藏》。

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白云真人》，《道藏》。

⑥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薛知微》。

汧、陇之间。”<sup>①</sup> 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亦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三十余所”。<sup>②</sup> 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尹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喆的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sup>③</sup> 由于全真教取得“天下道教”（实际上只限在江淮以北的道教）的领导地位，故只经过两三代人的经营，全真教的宫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北方广大地区。世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sup>④</sup> “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sup>⑤</sup>

从邱处机入主长春宫管领天下道教到李志常掌教（1224—1256）这三十余年中，蒙古大军正忙于东征西讨，为什么会给予全真教如此巨大的支持呢？这个问题是解开全真教与蒙古关系之谜的关键。

首先，全真教在金末即已拥有较多的徒众，比起当时的太一教和大道教来，虽然后起，但势力和影响远非二者可比。既然它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又有兵家可借之势，蒙古当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蒙古民族，光凭军事力量来征服各方面都比它先进的中原地区，是很困难的。蒙古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全真教的支持，可以利用它来帮助蒙古王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洞真真人》。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白云真人》。

赵著：《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见《道家金石略》。

高鸣：《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见《道家金石略》。

⑤ 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见《道家金石略》。

收揽人心，安抚民众，以稳定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牧师总是跟着刽子手的后面走，事实上，邱处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叮嘱弟子一定要把握住“大兵之后”这个良机。或许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全真教的领袖们也确实为蒙古王室做了不少颇有成效的安抚工作。

元太宗八年（1236），全真教主尹志平往终南山修复祖庭，“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sup>①</sup>当时金源甫亡，蒙古大军正欲牧马江南，后方之安定自然十分重要。修复事毕，尹志平返回燕京，“道经太行，山间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陘，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遗。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积”。<sup>②</sup>既能安抚反叛，又能招降盗贼，有如此尽职之“牧师”，征服者安能不大加褒扬！另一方面，全真教既受如此褒扬，彼希图爵禄者自不待言，即便是饱经战乱，性命妻子难保，处于水深火热中之贫民，有如此安身立命之地，又焉能不趋之若鹜！

其次，全真教之所以受到蒙古的支持，还在于它在蒙古前期充当了蒙古统治者学习“汉法”的老师。蒙古贵族在西征之后，即欲饮马黄河、长江，征服金、宋，建立以中原汉地为中心的大一统王朝。这种战略意识，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的几代当权者中一代比一代更明确。但要征服汉地并治理汉地，全盘搬用游牧民族的统治方法，显然不能奏效，所以必须“以汉法治汉地”。当时

弋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甘水仙源录》卷三。

② 弋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

的蒙古汗庭并无汉族士人佐政，成吉思汗最早召见的汉人并不是儒士，却是标榜“三教圆融”的全真教首领邱处机。邱处机以道士的身份谒见成吉思汗，同时也发挥了儒家士人佐政进谏的作用。成吉思汗询问长生久视之道时，邱处机以道士的身份“告以清心寡欲为要”；问为治之方时，则以儒家的口吻“对以敬天爱民为本”；且“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sup>①</sup>虽然这些只是陈词老调，并无新意，却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

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诏求通晓五经之士以教太子，李志常主动向太宗“进《易》、《诗》、《书》、《道德经》、《孝经》，且具陈大义”。1233年，太宗诏立国子学，选蒙古贵官子弟十八人为学员，命李志常主之，冯志亨副之。国子学即设在长春宫内。冯志亨“乃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受之间……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sup>②</sup>宪宗蒙哥在位期间，也经常召见李志常，“咨以治国保民之术”。<sup>③</sup>这也同样是把全真教的首领当作政治、文化参谋，为以后统治中原作充分的准备。

显然，上述这个方面的工作，是蒙古铁骑无论怎样勇猛骁悍都无法办到的。全真教为蒙古帝国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劳，自然应该受到嘉奖，朝廷屡有封赠。但是，在元世祖既定江南以后，情

《元史·释老传》；《孟子·公孙丑上》：“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欤？”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赵著：《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六。

王鶚：《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三。

况却有了不利的变化，北方已比较安定，而江南新附，元室开始利用在江南势力较大的正一道。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忽必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赐冠、服，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统领江南诸路道教。十五年，授张宗演弟子张留孙为“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次年，又诏谕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成宗即位后，赐留孙“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sup>①</sup>且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元室有意识地分裂正一道，令张留孙“别自署籍”，<sup>②</sup>独树一帜，建立“玄教”。这样，三大教派的格局基本形成，全真教居河北、山东、河南、河西，在北方；玄教居淮东、淮西、荆襄，处江淮之间；龙虎山正一道仍居江南。全真教在江淮以南并无势力，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颇受冷落。其间由于《化胡经》之争，几次与佛教进行大辩论，但均告失败。至元十八年（1280）元世祖下令焚毁道经，禁止全真教举行斋醮活动，并勒令全真教退还所侵占之佛寺，对全真教进行抑制和打击。

元成宗在位时（1295—1307）禁令稍弛，武宗即位后，又对全真教倍加重视。至大三年（1310）在全真掌教苗道一的请求下，武宗加封了全真教的祖师和重要弟子。北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喆）由“真君”加封为“帝君”，北七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由“真人”加封为“真君”。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由“真人”加封为“大真人”。<sup>③</sup>此后，全真教持续发展，与正一、

<sup>①</sup> 《元史·释老传》。

吴澄：《神德真君张公行道行碑》，《吴文正集》卷六十四。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道藏》。

玄教三足鼎立，三分天下，一直持续到元末。顺帝时（1333—1370）全真教由女真人完颜德明掌教，这时，全真教也同元朝统治一样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全真教与蒙古帝国的关系可谓息息相关。在蒙古大军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时候，全真教也随之遍地开花；在元朝衰落，风雨飘摇的时候，全真教也难以自保。邱处机虽然看出蒙古大军将统一中国，却没有料到它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随着朱元璋夺取天下，全真教也彻底结束了它的辉煌时代。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也懂得在打天下的时候要获得各种势力的支持，尤其是道教的支持。正一道张陵的子孙世居江南，他们信奉的天师道源远流长，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成宗大德八年（1304）又敕封三十八代天师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地区的符箓道派都归正一天师管辖，正一道的势力越来越壮大。1361年，朱元璋即“命有司访求招聘，而天师始游，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上以手书赐答”。<sup>①</sup>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1378）马上表示支持，朱元璋也表示将保护正一道，他说：“联闻汉祖天师，道德在躬，动得鬼神之力，一嘘一吸间，天道为之晦冥，雷霆诸神，莫不受命。以此辅国济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灵名历四十余代而愈著也，今吾师既临乃祖之位序，当继乃祖之成烈，有非他术之可同者。愿师澄心定性，以

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

凝道功，使前灵之迹益显，则龙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sup>①</sup>并且命令有司，“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诸人勿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sup>②</sup>1367年，朱元璋致书张正常，云：“予近自正月，为国家之事，心所欠者，欲奏闻上帝，奈无人捧词至于天庭，故差人诣天师门下，望天师以彼祖宗之灵，必当诚心差精通道妙之师，捧词达天，以申祈祷之请，即师之虔意也。”<sup>③</sup>欲请张正常上告天庭，下降符命，以示“奉天承运”。张正常很识时务地上了劝进表，歌功颂德，次年，朱元璋即帝位于南京，建号改元，张正常入贺，赐宴。太祖“准赐蠲通户及大上清宫徭役。宴毕，内降制书，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仍给银印，视正二品。特设玄幕之佑曰赞教、掌书等官”。<sup>④</sup>虽然如此，太祖还是革去了张正常的“天师”之号，止称大真人。朱元璋虽然做过和尚，但他对佛教和道教的认识仍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虽然佛道皆有助于教化，但治国之本，仍是儒教。他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sup>⑤</sup>所谓“惟常是吉”，也就是“神道设教”，就是指统治者要认清佛道二教之理“本非实相”，佛国天界，皆为诱导愚民向善之途，故有补于“王纲”者，即可保护，坏灭人

① 《皇明恩命世录》卷二，《道藏》

② 同上。

同上。

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

朱元璋：《三教论》，《明太祖文集》卷十，黄山书社，1991年。